

张爱玲“贵人”黄岳渊

□袁国松

1943年早春的一个上午,23岁的张爱玲,怀揣一份推荐信和自己的两个中篇小说,来到上海愚园路608弄94号,小心翼翼地叩响了“紫罗兰庵”的大门——“鸳鸯蝴蝶派”主将、资深编辑家周瘦鹃的公寓。

仅仅数月后,名不见经传的文学青年张爱玲,以这两篇成名作,轰传上海滩!

中国传统文化常说,一个人的成功,需要高人指点、贵人相助。为张爱玲写推荐信的那位“贵人”是谁呢?他叫黄岳渊,是浙江奉化人、沪上知名的园艺家。他与周瘦鹃同有园艺之好,由是结为挚友。那么,张爱玲与前辈黄岳渊有怎样的一层关系呢?当代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专家,多称黄为“张爱玲母亲娘家的远房亲戚”、“本家娘舅”,而实际情况究竟如何呢?

黄岳渊,名渭,别名刻曲灌叟。他的祖父为奉化萧王庙黄家岷村人,后移居到下蹲驻村,育有振魁、振元二子。溪口镇西南的下蹲驻村,地处剡溪上游,为“剡源九曲”之第二曲。黄家人除了务农,还开了一家“黄万利商行”,专做宁波、江口、溪口、新昌一线的竹排运输生意。

黄岳渊七岁入私塾。十来岁的一天,师生问答。老师说:“好好用功,将来一级级考上去,秀才、举人一直考到进士。”他说:“哎呀,考上了进士就再考皇上!”老师说:“皇上是不能考的,有太子呢!”他又说“假如太子不慧或不肖,付他以国事,国家岂不危殆?”

时当太平天国平息之后,清廷法令森严。老师震惊之余,无以应答,便对黄父说:“你儿子意志不纯,若再攻读,将来恐有灭门之祸。”于是辍学,被父亲贬为牧童。

黄岳渊14岁那年,新昌的舅父见他可怜,便将他招至家中南北杂货铺当学徒。成人后,他参加了反清秘密组织“平洋会”,而后又东渡日本加入同盟会。不久回国,打入清政府上海水陆厘金局任总巡,并为同盟会秘密搜索情报。1909年,他在上海真如松浜桃溪购地10余

亩,经营“黄氏畜植场”。

辛亥革命时,黄岳渊追随陈其美,任沪军都督府参事,参加光复上海、浙江之役,后被陈其美委以台州都督。革命胜利了,黄岳渊便彻底弃政归田,潜心研究他的园艺。

真如的黄氏畜植场,被上海人称之为“黄家花园”。他先后为荣德生、吴昆生等名流翻扩花园,名声大振,被推崇为园艺权威。1929年,他出任上海市花树同业公会会长。30年代,他曾与日商等竞争承包无锡蠡园翻园业务。最终,黄岳渊以价低质优而中标。抗战前,黄家花园举办过大小菊展十余次,屡获中外金银奖牌、盾杯。每至金秋,“黄园主人”黄岳渊经常要呼朋引类,请人家来园中雅赏。座上宾就有于右任、谢闲鸥、周瘦鹃、郑逸梅、严独鹤、包天笑等名流;大小各报也纷纷报道,传为美谈。由此,当时的上海有“不识黄园菊,枉为上海人”之说。日寇侵占上海后,真如黄园被日伪霸占。黄岳渊便在法租界另建了新黄园。沦陷期间,梅兰芳蓄须明志,曾一度避居黄家新园。

1942年,黄岳渊、黄德邻父子编成了园艺书《花经》,1949年由上海新纪元出版社印行,郑逸梅、周瘦鹃为之校订。郑逸梅十分赞赏《花经》,说其“略胜于清初陈淏子的园艺名著《花镜》”。解放后,黄岳渊移居香港,后受于右任等人之邀,定居台湾,1964年春病逝。

再说张爱玲显赫的身世吧。她的祖父张佩纶,为清末名臣,祖母李鞠耦是李鸿章女儿。母亲黄素琼(后改名黄逸梵),湖南长沙人,为清末长江七省水师提督黄翼升的孙女。当年,黄素琼是位新派女人,常来黄园赏菊,与黄岳渊相识。同姓三分亲,两人还攀上宗亲,说道起长沙、奉化黄氏各自脉传。黄岳渊年长黄素琼十多年,两人便以兄妹相称。其实,1942年张爱玲从香港回到上海后,最初以英文写作,因为英文杂志的稿费远比中文杂志高。在黄园,作为“本家娘舅”,黄岳渊曾向周瘦鹃说起张爱玲写作的才华,只是没引起周的在意。有一次黄周相

聚,远远的张爱玲还见到过周瘦鹃。

对于张爱玲首次叩访周瘦鹃一事,周氏后来有一个详细叙述:“一个春寒料峭的上午,我正懒洋洋地呆在紫罗兰庵里,不想出门,眼望着案头宣德炉中烧着的一枝紫罗兰香袅起的一缕青烟在出神。我的小女儿瑛忽然急匆匆地赶上楼来,拿一个挺大的信封递给我,说有一位张女士来访问。我拆开信一瞧,原来是黄园主人岳渊老人介绍一位女作家张爱玲女士来,要和我谈谈小说的事。我忙不迭赶下楼去,却见客座中站起一位穿着鹅黄缎半臂的长身玉立的小姐来向我鞠躬,我答过了礼,招呼她坐下。接谈之后,才知道这位张女士生在北平,长在上海,前年在香港大学读书。”

那一天,两人谈了一个多小时。分别时,周瘦鹃告诉客人,自己平时比较忙,看完这两个小说稿,需要一些时间,请她一周后再来听回音。

一星期后,张爱玲如约来到周家。周瘦鹃指着稿本,连声称好,问:“我主编的《紫罗兰》即将复刊,你是否愿意将这两篇小说发表在这本杂志上?”张爱玲一口答应了。

一个月后,复刊后的第二期《紫罗兰》杂志上,张爱玲的《沉香屑·第一炉香》全文发表,卷首还有周瘦鹃的《写在〈紫罗兰〉前头》一文,高度评价了张爱玲的这篇小说:“请读者共同来欣赏张女士一种特殊情调的作品,而对于当年香港所谓高等华人的那种骄奢淫逸的生活,也可得到一个深刻的印象……”这被后人称之为“国内第一篇盛赞张爱玲作品的评论文章”。

《沉香屑·第一炉香》发表后,这篇“特殊情调”的小说很快受到读者广泛好评。周瘦鹃趁热打铁,决定将张爱玲篇幅较长的《沉香屑·第二炉香》,分三期热推,吊足了读者们的胃口。从5月到8月,这“两炉香”差不多“烧”了整整四个月,初出茅庐的张爱玲声名鹊起,迅速蹿红,成为引人瞩目的青年作家。

此后,柯灵先生主编的《万象》、中共地下党掌控的《杂志》,都向她

拉稿。1944年8月15日,张爱玲第一本小说集《传奇》由上海《杂志》社出版发行。初版本一经问世,四天内便被一销而空,一时洛阳纸贵,轰动中国文坛。此时,整个上海都在议论着张爱玲,她的传奇家世也被披露,人们诧异于她身上还流着李鸿章、张佩纶的血脉。

从1943年到1944年,仅仅两年时间,才女张爱玲迅速攀上了文学巅峰,可谓创造了“20世纪40年代文坛的一个奇迹”。当时,为之最高兴、最得意的人,除了张爱玲的母亲和姑姑,还有一位当然是她的“本家娘舅”、“贵人”黄岳渊了。

时光的长河哗哗流,世上不复再有黄岳渊和张爱玲。然而,岁月冲刷不掉的是他们的智慧结晶,还有精神存在。

近些年,大陆猛猛地刮起了“张爱玲热”,在此已无需多言。黄岳渊呢,他的那部不朽的园艺书《花经》,1985年被上海书店再版,深受那些爱好花花草草的知识分子青睐,影响甚广。知名女作家池莉,便是《花经》的读者之一,末了她写了一篇流传很广的励志散文《一生只做一件事》。

“黄岳渊先生在宣统元年的时候本是一名朝廷命官,斯时将三十。一日黄先生想:古人曰三十而立,我该如何立人呢?他想,做官要应付人家,做商呢又要坑害人家,得做一件得天趣的事才好,才算立了为人的根本,于是,黄先生毅然辞官隐退。他做什么呢?据说当时的文坛名人周瘦鹃、郑逸梅等人皆为黄先生的花木挚友。黄先生养花养出了精神文明,养出了人间知己,养出了《花经》这等好书,恐怕这才叫养花种草!这才叫做了一生一件事!”池莉在文中顿悟:人的一辈子只能做一件事。最后,她自己丢掉了花铲,就做一件事——写作。

当年,黄岳渊成为张爱玲文坛成名的“贵人”。而今,又是一位知名女作家,池莉无意间成了黄岳渊生前所始料不及的。

毕业季,那些形态各异的毕业证书

□许霖

每年的毕业季,各个院校都会走出一批批的毕业生,他们手捧毕业证书,或奔赴工作岗位或向更高的知识层面迈进。近日,区档案馆精心挑选了20多本各类毕业证书,从晚清、民国到新中国,时间跨越100多年,向市民展示了我国教育事业的变迁和发展,也展现了宁波等地教育的峥嵘往昔。

每一本证书都深深打上了历史的烙印,晚清时期,把龙纹作为证书的纹饰,用皇家的懿旨作为证书的抬头,证书涉及的内容条目较多,另置上祖上三代人的姓名以防假冒,成绩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可见严谨;民国初期沿袭了晚清的版式,但去除了龙的纹饰;民国中期开始,除了在版式上与现代的毕业证书在有区别外,毕业证书上还附加了印花税;新中国成立前后,毕业证书的版式开始变化,逐渐取消了繁体字,书写的格式修正为自左向右,纵向书写变横向书写,与国际行文格式接轨。这些形式不一的毕业证书,折射出中国近百年来教育事业的改革和发展,同时对于研究宁波和浙江等地的教育事业发展较有价值。

馆藏浙江省第一所私立师范学堂的毕业证书,今年已有“107岁”。馆藏的毕业证书主人是卓士冈,松谷人。据档案资料显示,清朝末年,外侮日逼,有识之士痛感欲振兴民族,首当发展教育,培养人才,而办新式学堂,老式郡县学或书院出来的人已无法胜任培养教师一职,迫在眉睫的是培养一批新式教员。1905年(清光绪三十一年),宁波士绅张美翎与陈训正等提出“鉴于义务教育刻不容缓,造就师资尤为先务”,与时任宁波知府喻兆藩商定,把位于月湖书院街的月湖书院(现宁波月湖饭店址)改为宁波府师范学堂,这是浙江省最早的一所师范学堂(比杭州女子师范学堂和浙江两级师范学堂分别早一年和三年),张美翎首任学堂监堂(也称监督,即校长)。据史料记载,宁波府初级师范学堂于1905年9月12日在府署招考,与试者有200余人,录取127名,首批学生毕业于1906年(完全科的肄业)。当时的学堂完全科设修身、教育学、中国文学、算学、博物、理化、习字、图画和体操等10多门功课,修业为5年;简易科减少读经、讲经、习字等课程,修业年限为一年,分文理两科,理科除算学外,又设有动植物课。理科教员后来成为中国植物学的开拓者,如中央研究院自然历史博物馆观光的教授。学堂学生可不缴纳学费,毕业后若不肯尽教师之职义务,则勒其缴纳在学校学习时的学费。1912年宁波府官立初级师范学堂改为宁波师范学校。1923年,并入浙江省立第四中学(现宁波中学),设师范科。1933年,浙江省立四中师范科最后一届学生毕业后停办,至此,我省最早从事师范教育的学校自建校(科)到停办共经历了28年,先后培养了师范毕业生457人,其中不乏有识之士。奉化的王任叔为该校1920届毕业生,曾任共青团浙江省委书记的袁古怀和曾任中共慈东及慈西委员的姜昌林均为该校1925届毕业生,中共奉化县委第一任县委书记董子兴也曾就读于此。

馆藏宁波地区第一所所高校——四明专门学校的毕业证书,相当于现在大学一年级的水平。这所宁波历史上的第一所高等学府也是全国第一所私立法政学堂、浙江省第一所法政学堂。馆藏档案显示,文凭的主人1876年出生于奉化,高校毕业后,先后在浙江省高院、浙江的武义、桐乡、江山、东阳、象山、鄞县、定海等县司法机构担任书记员、承审员、候补推事、主任审判员、推事等职,1947年1月14日,71岁高龄的他担任永嘉县地方法院推事。根据档案资料显示,清光绪年间,省、府、县的各级审判厅相继建立,地方自治也次第施行,清政府为了培养佐理新政、实施新律的法政人才,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颁发各省设立法政学堂的旨旨。由学部奏定的《法政学堂章程》规定,法政学堂“以造就完全法政通才为宗旨”,参照大学堂法律门的课程授课,属高等教育范畴。1905年,宁波府鉴于宁波五口通商后,有关法政方面的人才奇缺,决定在全省率先举办法政学堂,将府治旁同知署旧址的“孝廉堂”(书院性质,今解放北路91号大院内北侧)改为“宁波法政学堂”。1906年春,经学部核准,宁波私立法政学堂开学,共招收学生52人。据1992年8月由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教育大辞典·中国近现代教育史卷》一书中记载:我国私立法政学堂最早出现在浙江,即宁波法政学堂。1912年,经教育部核准,宁波私立法政学堂改为“公立四明法政专门学校”,仍属大学层次。1913年,奉教育部令学校办至在校学生毕业为止,1914年春正式停办。原址改为“宁波公立甲种商业学校”,呈请省教育厅批准,其性质为中等实业学校,相当于今天的中等专业学校。自此,宁波地区第一所高校历时8年时夭折。直到1956年9月邵逸夫捐建了宁波师范学院,宁波才重新开启了高等教育的大门。

馆藏奉化目前最早的本科毕业文凭——浙江法政专门学校的毕业证书,证书的主人是奉化土垠人,26岁毕业于浙江公立法政专门学校法律科本科班,同年担任浙江实业厅咨议;1922年,任浙江省省长公署咨议,1924年任直鲁联军总司令部军法官;1934年任司法部甄拔律师,同年11月22日加入宁波鄞县律师公会;1935年,当选为鄞县律师公会会长;解放前弃文从商,在宁波做过船运,开过米行。1956年后,迁回奉化居住。据资料显示,中国近代高等教育肇始于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1905年10月,清政府通咨各省设立法政学堂,1906年5月,学部复通咨凡未设法政学堂之省应一体设立,业经设立者应酌量扩充。同年秋,浙江巡抚张曾敫着手筹办浙江官立法政学堂,并命会办许邓起枢进行招收新生工作。1907年春,开学上课。1912年10月,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先后颁布《大学令》和《专门学校令》,就高等学校的设立等问题做出具体规定,浙江省的高等教育也因此从裁撤、新建、升格等方面做了相应的调整。经过调整,浙江的高等学校在数量上有所增加,有之江大学,医药、法政、工业、农业、体育等5种专门学校共6所高校,在专业化程度上有了明显提高。浙江官立法政学堂改名为浙江公立法政专门学校,在校学生1714人,改名后,增设本科,修业年限改为:别科3年,本科一般为3年加1年预科。1924年实行壬戌学制后,改为省立。1929年,接到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第946号停办的命令,学校于1931年最后1班学生毕业后办理结束工作。从官立法政学堂到省立法政专门学校,前后共办学25年,培养各类毕业生1800人。

馆藏最早的档案专业毕业文凭,由中国人民大学颁发于1964年7月,证件持有人为溪口镇杨墅村人徐淑金,其曾在北京市政府、北京市档案馆等地工作过。据资料显示,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培养档案专业人员,1952年,在中国人民大学创办了档案专修班,次年扩大为专修科,1955年,在专修科的基础上成立了中国人民大学历史档案系,为国家培养了大批档案工作者。1954年11月,国家档案局成立,社会主义档案事业有了组织保证。1988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正式颁布实施,为中国档案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法律依据。1996年9月,在北京召开了第13届国际档案大会,来自130国2662名档案工作者参加了这次盛会。



徐振定 摄于袁村白岩山

“天眼”参观记

□林崇成

自从我国科研部门在贵州省平塘县的崇山峻岭中安装了一架直径500米的全球最大射电望远镜后,吸引了无数的参观者,引发了科技旅游狂潮,不甘寂寞的我也于近日去凑了趟热闹,若问感受如何,可谓获益匪浅,大开眼界。

6月10日中午,我和老友坐上11时14分宁波开往贵州凯里的k848硬卧列车,次日中午12时37分即到凯里市,从凯里花70元钱坐中巴当晚才到平塘县城,路途相当遥远,沿途多广告牌,其中最雷人的广告语是“欢迎您来到全球看得最远的地方”。清晨起来,旅店的老板再三告诫我们要坐直去克度的车,否则会绕行,多花钱又耽误时

间。果不其然,车站的各路车主一见我们便来揽客,而且漫天要价。我们坐上了直达克度的车,票价是26元,一路颠簸,加之天下着滂沱大雨,能见度差,车速不快,行驶了3个多小时,直到看见三幢占地广泛、品字形布局的米黄色建筑时才下车,这是克度天文体验馆。进入大厅顿觉内部布置科幻,头顶是苍穹,繁星闪烁,大小不一的数十根各种色彩的蘑菇状立柱支撑着厅面与穹顶,犹如置身于世博会展厅中。来不及细看,每人的手机、手表、钥匙等凡带金属和数码产品的物件都被保存在指定的箱体内,突然没有了一个圆柱形的星座平台,图文并茂,刻有达尔文、爱因斯坦等与星座对应的科学巨匠的头像和文字,给

门的车辆,开往47公里外号称“天眼”的射电望远镜所在的山头。

沿途是喀斯特地形,山势险峻,车辆沿着新修的柏油公路在山中穿行,或爬坡,或进洞,山谷间偶尔有几间破烂的瓦房山现,那是山民搬迁后遗留的旧居,为了保证天眼不受任何信号或磁场的干扰,周围30公里的住民都搬走了。经过近2个小时行驶,车子终于停在了山腰间一幢绿色的巨大海螺形的建筑前,原来这是参观接待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翻过对面的山顶就能看到天眼。接待处里面可购物、休息,还有非数码的老式“海鸥”相机连同柯达胶卷出租,价格为每次150元。雨下得很大,眼前一片雾气,谁也没有租相机拍照的念头,大家都打着伞,依次顺着2米多宽的木结构台阶往对面的山顶攀登。我们俩走在前头,台阶上每隔几十步设有一个圆柱形的星座平台,图文并茂,刻有达尔文、爱因斯坦等与星座对应的科学巨匠的头像和文字,给

游客以科普教育。

终于到达山顶的观景平台,低头一看,猛然间惊心动魄,一架巨大的银灰色的直径500米的“大镗”就在脚下,那是利用难得的中间凹陷、四周山峰相连的特别地形建造的,投资巨大,耗时10年。“天眼”的大镗底下有平顶的建筑和车辆,四周山头用铁丝网隔离,外人不能进入。观景平台尽管与“天眼”隔了一个山头,还是有武警站岗的,还有位为游客照相的女服务员,我请求她以“天眼”为背景给照个相,但终因雨下得太大效果不佳而婉绝。

带着些许遗憾离开了“天眼”。当地传说,“天眼”兼有天文和军事的双重功能,除了探测宇宙奥秘外,还能破译过往间谍卫星的信息。不管是真是假,反正“天眼”是当今世界最领先的科技成果,是我国的超级工程之一,是大国身份的象征,至少20年内没有他国可以超越。据说美国人急了,但财政窘迫,不知猴年马月才能追得上呢!